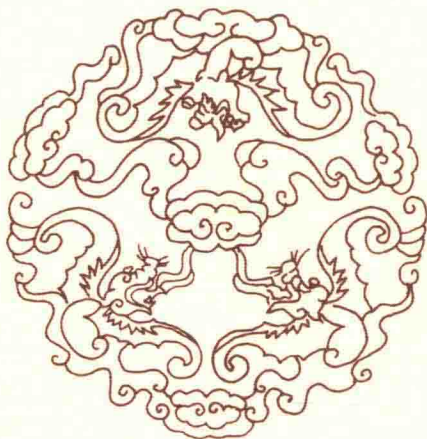


同济大学政治学丛书

中国政治思想史

ZHONGGUO ZHENGZHI SIXIANGSHI

田 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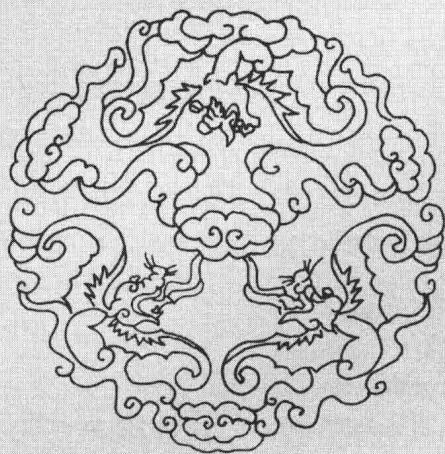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同济大学政治学丛书

中国政治思想史

ZHONGGUO ZHENGZHI SIXIANGSHI

田 亮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政治思想史 / 田亮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
（同济大学政治学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5466 - 3

I. ①中… II. ①田… III. ①政治思想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984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佳 文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38 号（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309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一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属性	(1)
二 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	(4)
三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论	(8)
四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编纂	(14)
第一章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命题	(18)
第一节 天人之际	(18)
第二节 性善性恶	(27)
第三节 王道霸道	(35)
第四节 义利之辨	(43)
第五节 道统政统	(51)
第二章 先秦时期政治思潮四大家	(60)
第一节 儒家	(62)
第二节 墨家	(74)
第三节 道家	(82)
第四节 法家	(90)
第三章 专制王权时代的政治思想与治道变革	(104)
第一节 秦汉以来儒家的政治主张和制度设计	(105)
第二节 法家思想与历代政治	(123)

第三节 道家、道教与历代政治	(133)
第四节 佛教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140)
第四章 西学东渐与中国政治思想的现代化	(152)
第一节 寻求富强——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命题	(153)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争论的焦点	(158)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分野和评价标准	(193)
第五章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201)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基本脉络	(202)
第二节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态和流派	(217)
第三节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224)
第六章 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和革命	(231)
第一节 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和演变	(232)
第二节 社会主义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	(246)
第七章 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思潮	(256)
第一节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脉络	(256)
第二节 民主宪政思潮在民国时期的发展	(265)
第三节 中国自由主义的特点和历史命运	(275)
参考文献	(279)

绪 论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文明建设至关重要，而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路径和方向的体认，固然需要借他山之石，吸收并借鉴他国的政治文化优秀传统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更为重要的则是对中国前人的思想历程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反思和总结。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必须根植于本土的历史和国情，更因为五千年文明史上所呈现的治乱兴亡、政权更替，让中国人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成为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即使以当今世界的眼光来看，仍有不可磨灭的独特价值。本章将略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特点、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等基本问题。

一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属性

政治意识是伴随着政治现象的产生而产生的。大体上说，人类的政治意识可分为三个层次：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学说。政治思想是一种理论化的政治意识，政治学说则是系统化乃至哲理化的政治思想，而作为一门学科，政治思想史既从属于历史学科，又从属于政治学科，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质。

首先，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中国学术界的实际研究状况来看，中国政治思想史曾在较长的时期内隶属于思想史的研究领域，被定位为一种专门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知识组成是那些已经过去的历史遗存，即已经成为“历史遗迹或遗物”的“历史的”知识。政治思想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一种精神产品，是和物质文明相对而言的。它主要关注的是历史进程中的思想

变迁，其思想的渊源、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的影响，因此，它所研究的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关于政治理想、治国方略的观点、理论。这种历史学研究视角着眼于还原历史的真实，可以说“求真”是其主要旨趣。

用历史学方法来研究政治思想史，意味着注重历史资料的考订钩沉，通过归纳政治思想的师承脉络和变化融合，来给思想或思潮订正流派，概括特点和评定意义。一般而言，这一研究路径不太注重运用现代学术理论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进行理论分析，其框架和理念基本上属于传统的史学语言模式，具有明显的新旧学术相结合的印记。

但是，这种历史学的研究视角不失其合理性。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思想具有历史性，与那些以当代社会及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不同，在研究方法和认知方式上必然要采用历史学的分析方法，在价值判断上也要参考和运用历史学的价值标准。特别是在确定和判断具体研究对象的内涵方面，参照具体的“历史语境”，即以具体的历史条件或历史环境作为“参照系”无疑是极为必要的。研究者通过历史的定位，对人们的政治思想或理论作出历史价值的判断或历史意义的评价，从而使我们得以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对于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的思想演进过程形成更为合理的阐释与认知。

其次，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政治学理论等政治学分支学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立的角度看，近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诞生正是为了回应西化派之“中国无政治思想”而兴起的。梁启超曾说他撰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大讲中国的政治哲学有其“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以彰显其民族主义之大义。再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发展历程看，中国大陆高校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政治学科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就一直作为政治学专业的分支学科以及主干课程，因而受到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基本理论和方法所构成的学科范式的规约，从而在学理上具有鲜明的政治学专业属性。

以政治学的视角，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应着眼于当代的政治发展，聚焦于历史上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是如何因应所面临的国家治理问题，试图从历史中借鉴治国理政的经验或智慧，因之，与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有关的诸多制度、组织、规则、行为、活动和关系，以及各种政治现象都是政治学重点关注的对象。与之相应，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对象不外乎是关于政治权力、政治关系、政治行为与规则，以及政治角色等各种政治现象的思想和理论认识。因此，现代政治学的价值标准，诸如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善治等基本概念和范畴必然成为分析、评价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的标尺和工具。这种评价体系和由此而形成的认知逻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构成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术性与科学性的认识前提和基本保障。

再次，从文化学的视野看，政治思想即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所关注的则是一定时期人们对政治或政权的态度、情感、价值观等。文化学关注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就当代中国语境来说，文化学视角认为，认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化价值，是我们得以面对文化传统并予以选择的认识前提，事关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乃至中华文明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如刘泽华学派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政治权力支配社会；由于士大夫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的承载者，又由于古代社会君主政治的行政管理能力是有限度的，于是政治思想便成为统治者用以弥补行政能力不足的重要补充手段，士大夫则成为行政管理和思想统治的双重实施者；自汉武帝独崇儒术开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形态渐次形成，士大夫阶层为了达成主流思想的政治身份化而不遗余力，同时他们也为儒家思想及其政治价值观念能为全社会接受而竭尽其传播、教化、宣讲和言传身教的功能。

将政治权力和政治统治与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紧密地结合起来，用普遍的、长期的道德教化来弥补管理能力的不足，这种历史选择的结果则是思想文化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统治手段。用古人的话语表述即所谓“道治”。在刘泽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作者借鉴了“政治文化”理论，从政治价值、政治意识、政治心态等层面阐发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某些命题。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思想体系对于政治运作和政治发展具有强劲的统一力。传统政治思想所蕴含的政治价值、观念和信仰，等等，在维护君主政治秩序方面实际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而且渗透充盈在社会文化之中，演化为一般社会成员的普遍政治选择，所谓“荡诸四海，变习易俗”，对整个民族文化影响至深且远。政治思想在传统中国的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思想与政治运作、思想与政治制度、思想与人们的行为选择之间，实际存在着或明显或隐蔽的互动过程。因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必然有助于深入揭

示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要完整地解读历史和解析传统与当代，就需要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进行深入的剖析，这就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化意义。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更径直将文化上的使命视为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根本目的：“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树立中华民族文化形象，确立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参与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这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应有的担当。

二 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

近代以来，不断有学者试图概括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梁启超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特点概括为三，即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要之此三种主义，为我国人夙所信仰，无论何时代何派别之学者，其论旨皆建设于此基础之上”^①。他指出：“政治是国民心理的写照，无论何种形式的政治，总是国民心理积极的或消极的表现。”^②他还说：“盖现代社会，本由多世遗传共业所构成。此种共业之集积完成，半缘思想，半缘制度，而思想又为制度之源泉。过去思想，常以历史的无上权威无形中支配现代人，以形成所谓国民意识者。”梁启超认为，晚清以来中国移植欧洲政治制度往往名不副实，就是因为“制度不植基于国民意识之上”^③，因此，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探寻必须从所谓的“国民意识”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出发。

萧公权则指出，中国政治思想不同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两大特点。第一是“重实际而不尚玄理”。“盖西洋学术，重在致知，中国学术，本于致用。”“致知者以求真理为目的”，意图建立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而“致用者以实行为目的，故每不措意于抽象之理论，思想之方法，议论之从违，概念之同异。意有所得，著之于言，不必有论证，不求成系统。是非得失之判决，只在理论之可否设张施行。故二千余年之政治文献，十之八九皆论治术”。第二个特点为“多因袭，少创造”。因为中国学术常常着眼于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于是思想为事实所限制而随之转移，超越时地之创说自难生产”。秦汉以后两千余年历史中的社会环境变化不大，于

①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重印版，第3页。

② 同上书，第232页。

③ 同上。

是“思想自多因袭”；“中国之君主政体，秦汉发端，明清结束，故二千余年之政论，大体以君道为中心”，因而发展出“精确完备”的“专制政体理论”。^①

刘泽华认为“王权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所在，“传统政治文化的总体特征及其本质精神，诸如：社会组织方面的王权主义，宗法意识，等级观念，平均主义；国家权威方面的大一统观念，正统主义和三教合一的意识形态；民族关系方面的华夏中心意识，文化同化主义；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忠君爱国，重义轻利，慎独和出世观念；政治思维方式方面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历史循环等等”^②。作为“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的王权主义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

刘泽华、张分田还曾概括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四大特点：

其一，政治学与哲学、伦理学浑然一体，政治伦理化的倾向极为明显。

其二，君主论是核心命题，君道是中心内容。儒家推崇礼治，法家主张法治、道家宣扬无为而治。由于圣王、君主被奉为制礼乐、行赏罚、为无为的最高主体，所以治国之道实际上是为君之道。由于贵贱有等、天子独尊、君权至上等政治原则获得全社会的广泛认同，许多人把君主制度看作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前提，所以政治学说所讨论的重点不是政体，而是政道。

其三，王权绝对化理论与政治调节理论融合为一体，政论多以组合命题展开。王权自我调节的理论，有民本论、君臣师友论、社稷与天下论、尚公论、天谴论、从道论、纳谏论、法治论等。

其四，“尊君一罪君”政治文化模式。所谓“尊君”，即尊崇君主制度、尊崇理想中的圣王或以尊崇时君为己任；所谓“罪君”，即非议、批判乃至抨击帝王。两者在互动中强化着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是臣民在道义面前自我剥夺了政治参与的主体性，即把最终

^①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588—590页。

^②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3卷《王权主义与思想和社会》，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决定全社会命运的权力托付给某一特殊的主体或冥冥之中某种超然的力量，诸如天命、圣人或贤君之类。^①

张分田还进一步指出，规范性、制约性、批判性思维很强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包含着丰富的规范性思维，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规范、品评君主的思想很早就理论化、体系化、哲理化”^②。

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受和谐文化模式制约而展现的思想进程”，这种和谐文化模式以人际和谐、群体和谐及天人和諧为基本内容；而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体系被概括为“究天之际，明修身之道，施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③。

林存光比较了中西古典政治哲学的差异，认为“古希腊古典政治哲学可以说遵循的是以制度为中心来寻求解决城邦政治出路问题的思维路向”，而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家则是选择了“以主体为中心来寻求解决政治出路问题的思维路向，不管他们推崇的是哪一种类型的圣王统治或主张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方式，他们也并非不关注制度的问题……但对他们来讲这却是低一层次的政治问题，他们所推崇的圣王明君是完全超然凌驾于国家与制度之上的独一无二、至尊至上的政治主体”，所以，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将一个有限的个体塑造成为一个无限的政治主体”^④；认为“内圣外王之道”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内核或主题，实质上是一个理想的政治主体性问题，是一个反身以求而以“主体”为中心来思考和寻求解决客观世界的问题的根本办法，此即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思想的形态与特质。林存光还认为：“政治哲学就是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最适宜于统治天下或作天下王的政治主体这两方面的统一之道”；所谓“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对中国的政治哲人而言，主要指的就是了解和探究天下的事务和本性”；“对中国的政治哲人来讲，最大的政治问题便是由谁和如何来平治和统一天下的问题，答案是最好或最理

① 刘泽华、张分田：《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史研究对象与方法》，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1页。

② 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研究的对象、思路与方法》，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③ 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④ 林存光主编：《先秦诸子政治哲学研究》，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239页。

想的的就是由圣人做王才能平治和统一天下，而圣人做王并不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而是一个主体性的问题”。^①

王绍光也提出了类似的思维路径以期体认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精髓，他指出：“中国历代先哲政治分析的基础不是政体，而是政道（包括治道与治术），政体思维关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而政道思维的着眼点是政治秩序的实质。”^②“治道”是指治国的理念，是政治之最高目的，是理想政治秩序；而“治术”是指治国的方式，包括古代典籍中所谓“治制”（治理国家的法制、体制）、“治具”（治理国家的各项措施）和“治术”（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方法）。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先哲往往把“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形式称为“制”，属于“治术”层面；相对于“治道”而言，“制”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从先秦诸子一直到朱熹、顾炎武、黄宗羲，各家谈的都是“政道”问题，或者说是“治道”与“治术”问题。就“治道”来说，“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而就各家的“治术”来说，“儒家强调德（礼）治、法家强调法治、墨家强调贤治、道家强调道治”，“从先秦到满清，历代政治都或多或少受到儒、法、墨、道各家的影响。虽然从政体着眼，看似没有任何变化；但从政道角度看，中国政治史却跌宕起伏、斑斓多姿、引人入胜”。^③总之，在王绍光看来，要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必须跳出西方政治学“政体思维”和“政体决定论”的框框，用中国自己的话语系统来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

唐国军则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学是以天道为终极渊源、以人道完善为皈依、以治道的落实为手段的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④，探寻天道、追求人道，以达治道大行，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学探讨的基本理论问题。

以上各家谈的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及其特点。自从国门洞开、西学东渐之后，伴随着艰难的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政治思想亦经历着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萧公权先生曾指出：“秦汉以至宋元之政治思想虽不

① 林存光：《重读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兼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诸范式》，《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1期。

② 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75页。

③ 同上书，第114页。

④ 唐国军：《帝制初期中国传统政治学体系建构——以〈新语〉整体性文本解读为基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乏新意义、新内容，而其主要之观点与基本之原理，终不能完全越出先秦之范围。必俟明清海通以后，外学输入，然后思想为之丕变。”^① 这个变化即为“近代国家”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自秦汉以来的两千余年的王权主义时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一直在维护君主专制的大前提下探求治国理政之道；即使在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那里，高调批评君主制度，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也没能走到“主权在民”思想这一步；具有近代意义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等政治理念，只有在西学东渐后才有可能产生。

西方思想的传入使国人有了反思传统政治观念的参照系，作为王权主义意识形态主体的儒家思想及其偶像孔子开始招致前所未有的批评和质疑。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诸贤先后质疑帝王的“超凡入圣”的资质和孔儒独尊之地位。与此同时，伴随着“天朝体制”的崩解，支撑传统政治理想的“天下”观念开始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在外力刺激下，近代中国政治思想逐渐疏离了传统政治哲学那种一贯的注重研求治国安邦之道的致思模式，开始用空前开放的心态思考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东西方的各种政治文化、思想、观念发生了极其激烈的碰撞。特别是在帝制被推翻，民国建立之后，人们原本期待的改天换地，却不能根本解决堆积成山的社会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走哪条路？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路径为何？面对沉痾，各家都试图开出疗救的药方。于是乎，思想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问题与主义”之争，如潮起又潮落，西方近世以来形形色色的各种思潮学说，无一不能在中国找到一批鼓吹者和追随者，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局面；新旧杂陈，中西交融，各家各派的政治思想主张多在论辩中展开，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各领风骚好几年，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演变的独特风貌。

三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论

（一）研究对象

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界定关系到该学科的学科属性问题。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①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 页。

版)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在这一时期“各个阶级、党派、团体和个人关于国家获得方式、任务、内容的理论和主张,各个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的理论主张”;而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学科研究目标定位为“阐明上述有关理论和主张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阐明这些理论、主张的作用和影响,阐明这些理论和主张产生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渊源”。

徐大同认为:“政治思想史所研究的政治思想是社会发 展一定阶段上,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政治实践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总结,集中表现为各种政治主张、政治观点、政治理论和学说。”^①而政治思想的内容是由政治实践的内容决定的;纵观人类历史,政治实践的主要和中心的内容是国家政权问题;因此,“政治思想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集中反映了人们围绕国家政权所进行的政治实践,是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国家的主张、观点、理论和学说”。

刘泽华则把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概括为:“研究历史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学派和不同人物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社会改造、以及通过国家机关和强力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理想、理念、方针和政策;研究这些思想、理论、方针和政策得以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实际政治的影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②刘泽华进而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对象还包括:首先是中国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如天人关系,人性论,中庸思想,物极必反说,理、必、数、道等必然性理论,历史观,圣贤观,等等;其次是关于理想国的理论,孔子的“有道”之世模式,老子的关于“小国寡民”的设想,庄子的“至德之世”“无何有之乡”的向往,孟子的王道世界,荀子的“王制”社会,农家人人劳动、自食其力、不分君臣的美丽世界,杨朱童子牧羊式的田园生活,等等,实际上都折射了思想家对所处时代政治现实的批判意识;再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政治的内涵,既包括处理各种政治关系,又包括对国家的治理,与西方政治思想相比较,中国的政治思

^①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导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

想较少关注超越层面，而更关注于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因此，治国的方略和政策也应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曹德本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是一个完善的学术系统，这就是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实现修身、治国、平天下。儒家经典《大学》对此作了精辟论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儒家所谓的“八条目”。具体说来，是要揭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历史背景、社会作用、发展规律、思想联系、价值取向、文化底蕴、历史局限等问题。另外，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政治思想家，不是孤立地讲政治思想，而是与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政治。政治的根本在于身体，而不是国家（孟子），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因此，伦理道德问题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此外，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还包括：重要概念、范畴，例如礼、德、法、刑、仁、义、爱、赏、罚、势、术等的研究；治国方略和政策；政治哲学中的天人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研究这些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实际政治的影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政治学说及其发展的过程，包括研究各种政治学说的特点、性质、内容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对现实政治、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同政治学说流派之间的争鸣、渗透、演变和更替的历史过程等。

从以上诸多学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界定可以看出：第一，大家公认，中国政治思想具有迥然不同于西方政治思想的特质；第二，大家公认，中国政治思想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伦理学有很强的共生性，因此，必须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置于中国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系统中加以研究，而不能够将历史上的所谓有关“政治”的思想抽出来单独加以研究。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论与其知识体系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一学

科是政治认识、政治思维的理论汇集，因而具有政治学的属性；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哲学上的认识、思考和理论是以往的人们所具有的，相对于今天而言，是一些过去了的思想遗存，于是又具有历史性”。^①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开拓者梁启超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有三种：问题的研究方法、时代的研究方法和宗派的研究方法，并分析了三种方法的长处和短处。第一种方法的长处在于能使人们对各种重要问题有“致密正确的认识，而且最适于实地应用”；其短处在于难以反映思想变化之间的原因和各种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第二种方法的长处在于能够展示思想变化的轨迹和时代背景，帮助人们了解思想产生的动机；其短处在于难以详解思想专题，容易割裂同一思想流派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种方法的长处在于易于说明思想流派的思想渊源及其发展蜕变，比较各派思想主张；其短处在于难以照顾到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难以说明思想发展的总体状况，易忽略影响较小的思想，等等。

杨幼炯概括了政治思想的三种研究方法和三种叙述方式。三种研究方法是：时代背景研究方法、历史比较方法和思想家个性研究方法。三种叙述方式是：编年体、列传体和学说体。

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吕振羽强调阶级分析法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的重要性，即特别注重思想人物及其政治思想的阶级属性。侯外庐在思想史研究中注重发掘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关注诸如先秦诸子思想的阶级属性等历史疑难问题的解决，注重实事求是、从材料出发，注重内容，不多作浮词泛论。

凸显政治思想史的政治功能的研究导向乃是五四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采取的基本态度——一种不妥协的批判封建主义和王权主义的导向。这一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刘泽华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②一书。刘泽华注重政治哲学的理论预设。一方面，他认为，从政治诸学科中的地位上讲，政治哲学“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另一方面，从

① 葛荃：《寻觅史家笔触——政治思想研究方法论刍议》，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② 参见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前，刘泽华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还出版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以及带有总结性质的专著《中国的王权主义》等著作。

与政治制度安排这类“硬件”相比较的角度讲，政治哲学是作用于人们思想与行为规范的“软件”。再者，他将政治哲学研究问题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确定政治哲学关注的主要是五个问题：（1）政治思想与观念中最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命题；（2）有关政治“为什么是这样”的理论与命题；（3）政治价值的理论依据；（4）有关政治范式化的理论与观念；（5）政治理论的结构与思维方式问题。他认为，不梳理政治哲学就难以把握中国历史的总貌和特点；因此，他着力对于天命信仰与王权认同、天序论与社会秩序及整合、道与社会规范、大一统与政治分合、王权至上观念与权力运动大势、人为贵与王政、崇圣与社会控制、崇公与抑私、改易更化论与改制变法、革命论与王朝更替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可以说，刘泽华对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的研究是非常全面的，但他的研究延续了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是建立在对所谓“王权主义”批判的预设下进行的，这种预设有可能造成研究者难以保持分析的中立性，从而使结论的效度与信度就有所下降。^①

张分田指出，思想史的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思想与社会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评说历史上的一位思想家的某一命题，不能脱离这位思想家的整个思想体系和思维逻辑，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不能脱离这个命题的具体历史内容，更不能望文生义而任意演绎。这是严肃的思想史研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②

刘晓的《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用较大篇幅讨论了政治哲学的概念、意义与范围问题，而且是以西方政治哲学的论述为学科坐标的。刘晓将政治哲学规定为“探讨政治价值尤其是合法性、正当性及理想政治秩序、建构政治价值范畴及其关系的元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批判理论”^③；并以之为方法指引，对现代新儒家关涉政治哲学的心性论、历史叙事、政治论述、国家论道、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自由与平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本源等进行了分析研究。

概括起来，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解读，无外乎两种基本路径：一种是用

① 任剑涛：《从方法视角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71—78页。

② 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6页。

③ 刘晓：《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线装书局2001年版，第33—34页。